

从莫干山会议对价格改革决策的影响看改革开放中的智力支持

□ 刘国新

摘要:1984年9月“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成为在改革开放史上,理论界知识界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为中央献计献策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使一批青年经济学者脱颖而出,走上历史舞台,为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本文通过对这次会议的考察,旨在说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的拨乱反正,也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邓小平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长远的根本大计”,习近平强调“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都在理论上阐明了改革开放与文化、人才和智力支持的关系。

关键词: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改革开放;智力支持

如果把改革开放比作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就涉及到系统的构成要素,其中智力因素是不可忽视的。1977年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主要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广受迫害的拨乱反正,但1986年,他说“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长远的根本大计。”“现在我们是知识缺乏,人才缺乏。越往前走,这方面的问题越大。”这就把改革开放需要文化知识和人才支持的含义讲得十分明确了。习近平在最近的讲话中强调“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既是对当前的工作指南,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本文以“莫干山会议”为例,来探索改革开放中的智力支持问题。

改革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劳动和经营的自主权,农民的生产成果和利益直接挂钩,从根本上改变了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的管理体制,“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城市改革的全

面进行。城市经济远较农村经济复杂,内外部联系涉及到计划、价格、财政、金融、贸易等领域和环节。在众多的经济改革领域中,价格改革因其涉及利益关系复杂,调整范围广,对国民经济运行影响大,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的价格体系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同类商品的质量差价没有拉开,不同商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形成部门、行业间十分悬殊的利率水平,使产业结构扭曲,企业间苦乐不均,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比如玻璃,如果按面积计算价格,就会大量生产薄玻璃;如果按重量计算价格,就会大量生产厚玻璃。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供求失衡必然导致整个价格体系严重扭曲。一些商品价格购销倒挂,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实行补贴。服务行业的价格普遍偏低,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倒挂,销价低于国家购价,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改革初期的成效也进一步显示出价格成为城市改革起步的中心问题。在承包等扩大企业自主权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1113页。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等各种激励措施下,凡事都讲利益。有利就干,无利不起早,利大的就愿意多干,利小的就不愿意干。价格信号失真就失去了正确的导向。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同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密切相关。价格改革面临着调整扭曲的价格体系和改革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的双重任务。

为此,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价格问题。困扰大家的是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而销售价不让动,进一步加大企业生产矛盾。当时也试图在调价以后,对利润增加的企业,国家把利润收回来补贴给亏损企业。试行的结果是: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这个方案在现实中也没有行得通。

1984年9月9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中,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他说:“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近几年来,国外许多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都建议我们在适当时候进行价格改革。他们认为,改革价格最好选在经济发展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候。现在中国有此条件,正处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从价格起步推动城市改革的选择和平稳推进的战略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84年11月,他指出,“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

二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成为在改革开放史上,特别是理论界知识界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为中央献计献策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会议在莫干山450号(大教堂)召开,《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村镇百

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先后参与联合主办。除了从1000多篇应征论文中评选出100多位与会代表外,还有部分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人员,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左芳、中宣部理论局贾春峰、中央组织部青干局闫淮、中央办公厅李英汤等以及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而且“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领导的同志,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因此这次会上,不仅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研室、中宣部、中组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的干部与会,还能间或见到一些领导同志的秘书。”“那次会议有许多组织领导者,最初发起有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在组织过程中引起了更多上层方面的关注。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是当时在中央农研室工作的王岐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岐山专门布兵点将”。

在会议筹备阶段分组中并没有价格组,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和焦点是价格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多年来对此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这样,价格改革的争论成为最激烈的,也最富有成果的,并由于会后很快被中央正式采纳而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国务院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专门设立价格研究中心。因此,在价格讨论中,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田源首先带来了他们的方案,主张对严重失衡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以及调整的可能性及其对财政、税收和经济的影响,论证了方案测算和不同力度方案的比较。这就是“以调为主”的主张。

当时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李剑阁介绍了周小川和楼继伟提出的另一种方案,就是用小步快调的方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可以减少价格改革过程

徐景安:《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欧阳淞、高永中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4—1015页。

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 <http://finance.qq.com/a/20130904/015204.htm>

华生:2011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四届)颁奖礼获奖演说,《双轨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 <http://blog.sina.com.cn/luasheng>。

中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他们提出,在市场发育不全、非完全竞争的国情下,不能简单靠市场,而是要以“供求平衡指导价格”为目标,组合使用价格政策与税收、财政补贴政策等相结合,控制总需求,逐步上调初级品价格,使价格体系合理化。为此,他们使用了现代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弹性的概念,进行了动态线性规划模型、投入产出和按国情改造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对比测算。他们的模型和论证,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现代经济学包括数理经济分析在中国的引进和运用,使与会者耳目一新。

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打破调派(大调派)和模型派(小调派)一统天下局面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据说他的硕士论文是以价格改革为题,已经做了相当的投入和研究。他认为不能寄希望于价格调整,那至多是宴会前的一点零食,不解决根本问题。关键是放开价格,让市场起作用。同时,也不要被有人用财政负担问题吓住,不敢搞价格改革。他把计划价格比喻为装了不锈钢的温度计,僵死过时。价格放开,搞市场化是给这个温度计换上水银,能根据市场供求灵活反映。因此,他主张采用放的方针,对能源、原材料等差价很大的生产资料,采用分批、分步、分类放的办法。这是当时持有可贵的完全市场派观点。

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等为代表的第三种主张是“调改结合”。“我与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生何家成、高粱、张少杰以及在会上刚认识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蒋跃,虽然并不是都分在价格组,但也卷入了讨论。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觉得可以采纳和综合双方观点的精华,走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向上,有些产品也可以同时外放内调。同时我们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发挥平抑供需和价格水平的主渠道作用。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的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的双轨制。”

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思路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相当多与会者的共鸣。因为对当时参会的中青年改革者来说,大家在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财产权多元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等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明显分歧。讨论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可行性和过渡模式问题。而对于这批大多经过“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来说,多数人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

杂性都有潜意识,因此,放调结合、双轨制的提法就比较容易接受。更重要的是,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很快引起会议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关注和肯定。他们认为,调的思路领导已经知道,放的思路过于激进、缺乏可行性。因此,当各个专题组选派一个代表下山去杭州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同志汇报时,华生被指定作为价格组的代表汇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

莫干山会议结束,留下几个人写报告。总报告由王岐山点将的国家体改委的笔杆子徐景安执笔。徐景安很会提炼讨论的要点和精华,也会把握给中央写报告的语言和分寸。他在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中,把价格组的意见归纳为两种思路,第一种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主要讲了调派的建议;第二种为“调放结合,先放后调”,主要讲了组织市场、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

报告之外,还加两个附件。田源写以调为主的建议,华生写关于放调结合双轨制的建议。华生以“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为题,提出总思路是因势利导,外改内调。即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后计划牌价已经全面受到冲击之势,改革价格制度,放开和组织计划外市场,使计划外多价归一和下浮,同时调整计划价格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步骤是先改后调,改中有调,控制每年物价上涨5%—6%的幅度,用5到6年平稳完成中国价格改革。

专题报告和两个附件上报之后,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同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发出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同时,1985年中央1号文件决定取消自1953年起实行了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合同内外双轨制。1985

华生:《莫干山会议的历史作用》<http://blog.ce.cn/html/91/107991-180925.html>。

徐景安:《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欧阳淞、高永中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页。

年4月12日,按照中央的安排,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在中央电视台19点30分黄金时间发布关于价格改革长篇电视讲话,公布1985年的价格改革方案,宣布“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

三

莫干山会议提出了很好的政策建议,为中央改革决策提供思路和方略。与会的这批青年学者理论成果的影响和扩大,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深入探讨。涉及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如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引进外资引力何在、农村家庭经济及其发展趋势、县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等。还引发了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如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所有制关系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都极大地助力了改革实践,并对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前期的经济学研究产生影响。

会议中涌现出一批人才,受到中央各部门的重视,经过历练,如今已经成为各部门骨干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里面有我们当下所熟悉的王岐山、马凯、周小川、楼继伟,以及仍活跃在理论界的著名学者华生、张维迎、周其仁等。

事隔多年之后,“莫干山会议”不曾被忘记。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透过理论界的这份荣耀,我们不仅能看到“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也能品味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生际遇,把脉知识分子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的历史律动。

在看到“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历史局限性和给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和漏洞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从双轨价格中套利所产生的寻租行为,导致社会腐败问题的孳生,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从而带来新的社会矛盾。

该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华生后来回忆,“实际上在莫干山会议上,包括会议的报告,写得并不是双轨制,最主要是说放调结合,放开计划外价格和调整计划内的价格,两条腿走路,完成价格改革。我

现在还记得,当时向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的时候说,一方面通过放开价格,让市场价格开始往下走,同时国家调整计划价,使得两个价格靠近,这样可以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过渡。但由于双轨制的名称特别响亮,后来大家都说双轨制,一说双轨制就是搞两个价格,一个产品搞两个价格,当时最形象的批评是说,这等于一个路上允许通行两个交通规则,既可以沿着左边开,也可以沿着右边开,结果一定是撞车,这是当时最形象的批评。其实当然莫干山会议提出、中央接受和宣布的是放调结合、双管齐下、稳步推进。”这是对当时情景的补充。继而他又对问题作了引申:“1986年我在文章中讲过,双轨制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整个体制转轨的特色,即增量渐进不断转化存量,既发展增量,同时又转化和调整存量,实行了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转型,应该说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变,中国体制的转变,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特征和轨迹。”这个判断是值得思考的。

2013年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新一届政府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他给在场的专家学者布置了一份“作业”:“请专家学者来帮助研究,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释放改革的红利?怎样通过推进制度建设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后劲?”李克强希望专家学者继续发挥专长,为政府建言献策,向社会解疑释惑,共同促进形成有利于深化改革、推动升级的社会环境。

2014年10月28日,习近平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时说,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无论是华生这批当年活跃在改革前沿的学者,还是习近平、李克强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关头,理论界、思想界怎样用自己的知识为改革开放服务,提供智力支持,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应该有怎样的历史担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华生:2011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四届)颁奖礼获奖演说:《双轨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http://blog.sina.com.cn/huasheng。

华生:2011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四届)颁奖礼获奖演说:《双轨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http://blog.sina.com.cn/huasheng。